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不同的世界 | 不同的梦想

日常生活批判系列



生命的尊严

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

透析哈莱姆东区的快克买卖

第二版

[美]菲利普·布儒瓦 (Philippe Bourgois) 著 焦小婷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生命的尊严

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

透析 | 克买卖

第二版

[美] 菲利普·布儒瓦 (Philippe Bourgois) 著 焦小婷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8-295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的尊严: 透析哈莱姆东区的快克买卖(第二版)/(美)菲利普·布儒瓦(Philippe Bourgois)著; 焦小婷译.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5
(培文书系·日常生活批判)
ISBN 978-7-301-15102-0

I. 生… II. ①布… ②焦… III. 尊严—研究 IV. 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0764号

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 Second edition, EISBN: 978-0-521-01711-4, by Philippe Bourgois,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不得出口。

书 名: 生命的尊严——透析哈莱姆东区的快克买卖(第二版)

著作责任者: [美] 菲利普·布儒瓦 著 焦小婷 译

责任编辑: 徐文宁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102-0/C·052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20.25印张 450千字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2003 年第二版前言

从 1995 年秋本书第一版发行到现在的七年里，在哈莱姆东区的街道上，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四个深刻影响本书中的毒贩及其家庭生活的变化。第一，美国经济进入了历史上最长的持续增长时期。第二，纽约市，尤其是哈莱姆东区的墨西哥新移民数量明显增多。第三，随着反毒战争的逐步升级，政府颁布实施了针对穷人及社会边缘者的半官方的量罪和监禁政策。第四，市中心贫民区的年轻人对毒品兴趣发生转移，大麻开始盛行，快克和海洛因在拉美人和非裔美国人（以下简称黑人——译注）中失宠。

2002 年，在我所住的街区，快克、可卡因和海洛因交易仍然存在，虽然只是一小部分人在偷偷叫卖，但在整个哈莱姆东区，还是很容易就能买到麻醉类毒品的，只不过多数交易都避开了警察视线，撤回室内进行。在街角竞相喊着毒品品牌、流动叫卖的毒贩少多了。更重要的是，那些从小就从父辈身上看到毒品危害的年轻的拉美人和黑人，对海洛因和快克继续持漠视态度。纽约城戒掉快克瘾的人甚至摇身一变，成了自传文学的作家 (Stringer, 1998; S. and Bolnick, 2000)。然而在美国各市中心贫民区，人们依然能够看到从前那些顽固的瘾君子。尽管由政府资助、以对话形式所做的毒品调查数据的准确性值得怀疑，但始于 1994 年的全国性年度家庭滥用毒品调查结果表明，90 年代“经常吸快克”的人数并未明显降低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2000)。但医院的急诊室和拘留所的资料却戏剧性地显示出，90 年代末到 2000 年对男性血样的可卡因检测呈阳性的人数降低了 (CESAR FAX, 2001)。

在很多大城市，快克主要隐匿在黑人居住的最贫困的社区，其交易点往往位于或靠近公建住宅楼区的空闲地段和废弃的楼房里。在纽约市，波多黎各人对快克的兴趣尽管比起以前有所收敛，但仍然是消费的主流。

与快克相反，海洛因在很多城市的消费量从 90 年代后期到 2000 年则有所提高。

美国大部分地区海洛因纯度增高而价格降低的事实，让国人对反毒战争的前景产生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海洛因主要在贫民区之外不愿吸快克的白人青年中流行，纽约市中心贫民区年轻的拉美人和黑人对海洛因，特别是皮下注射的海洛因兴味索然。2001年在哈莱姆东区的快克和海洛因交易点，前来买毒品的人群出现了高龄化现象，年龄大都在三四十岁或五十来岁。

总之，2002年海洛因和快克继续以上亿美元的交易额和其特有的致命性，危害着市中心贫民区的家庭，只不过哈莱姆东区年轻的市民更多的只是倒卖，而不消费。真正吸快克和海洛因的拉美人和黑人，一般都不会向其朋友吐露实情，因而对于其毒品兴趣大转移的原因，我们无从了解。不过在21世纪伊始，我们很庆幸，12多年来，参与街道文化的他们一直对大麻和麦芽酒情有独钟（Golab and Johnson, 1999）。

比毒品兴趣移转和政客们反毒立场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持续发展的美国经济带来了90年代后期前所未有的低失业率。让我颇感吃惊的是，至少在2001年到2002年经济暴跌之前，本书中的一些毒贩及其家人从经济的持续飞速发展中受益匪浅。他们当中约有一半人在2001—2002年经济下滑前，都曾设法介入了合法、低工资的劳动力市场。我将会在本版的后记中对此做一详尽注解，这里只想概要地提供一份2001—2002年经济衰颓期的情势：一名毒贩当了有工会会员资格的看门人，一位当了家庭保姆，另一位是水暖工的助手。其他几个人中，三个在一个未注册的包工头手下当建筑工人；一位是旅游纪念品商店的出纳员，他的两个姐姐一位是护士助理，另一位是秘书；一位毒贩的三个性伙伴中，一个是银行出纳，一个是保安，另一个在推销雅芳产品。毒贩的儿子们，一个是快餐店的收银员，另一个卖毒品，另外两个分别因卖毒和抢劫被监禁。有三四个毒贩的孩子在卖毒，但大都不卖快克和海洛因，只卖大麻。还有三名毒贩被判了长期监禁仍在监狱里服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很有可能以低廉的工资受雇于发展势头旺盛的监狱制造行业。

简而言之，随着90年代末期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雇主和工会把越来越多边缘化的波多黎各人和黑人整合到了劳动力市场，这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本书进行研究过程中的经济衰退形成悖谬。然而，即使在2000年夏季美国经济急剧上升的高峰期，大批街道青年作为边缘群体仍被排除在外，成了合法经济中完全多余的人，公然被纠缠在有利可图的毒品经济、发展繁荣的监狱制度、长期吸毒的困窘以及时时发生在彼此间的暴力之中。从长期的政治经济视角来看，且不考虑国家和地区经济的短期波动，像“9·11”事件、世贸大厦灾难后经济下滑，纽约市中心贫

民区穷人的未来并不乐观(2001年9月26日《纽约时报》A12版;又见2001年美国人口普查中心资料)。从区域发展的层面来说,20世纪最后30年,在全国50个州中纽约州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最为严重(2000年9月19日的《纽约时报》B5版)。

纽约市强大的低报酬初级雇佣市场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来自墨西哥农村的贫困移民人数的激增,其实他们正是冲着这些低报酬工作而来的。1991年我离开哈莱姆东区时,那里的墨西哥移民已是随处可见,本书也探讨了波多黎各年轻人和墨西哥新移民间越来越激烈的冲突。我在1994年英文版后记中也提到了他们,还附上了当地墨西哥人口快速增长的一组数据。90年代后期,在我住的那条街道上,这一增长速度的迅猛势头是有目共睹的。1991年,我所在公寓周边的那些街区,至少有三栋楼住的全都是墨西哥的新移民(还不包括从塞内加尔农村来的新移民住的那两栋楼)。最近一次我回去写此前言时,竟发现整个街区(临近我住的那个街区)全部“墨西哥化”了。那里有几十个墨西哥食品专卖店,而我在的时候还只有一家,且还没有挂牌,可能是因为没有正式注册。简言之,21世纪的黎明时分,虽然一个新的种族更替浪潮在美国经济的外围打造着哈莱姆东区,但这里的人们毕竟是在为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做着不懈的努力。

2002年,整个哈莱姆东区新兴的小型企业在被隔离、废弃的街区里崛起。1994年,在我住过的那个街区里,新兴的小型企业数量猛增。我家旁边那个空闲了十几年的垃圾场已经被一片新建的四层公寓楼所覆盖;另一边,在我搬去10年前毁之一炬的那座巨大的废楼,现已改建成半成品的楼房,供有毒瘾的母亲们暂住。另外还多了五个合法的商行:两个理发店,一家光碟出租屋,一家外卖的中国餐馆和一家比萨店。

街区里以前的那两个杂货店,一家还在卖毒品,但仅限于大麻。纯度更高的海洛因在街角也能买到,不过已不再只是曾经竞争激烈的那三个品牌公司的产品。正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住在那里时一样,夜里,工人阶级会把他们的公共场地让给那些贩毒、吸毒的人。但总的来看,在偶然的毒品兴趣转换和必然的大批低收入劳动力移民潮的支撑下,日益坚挺的美国经济使街道上的工人阶级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降低了为爬向上层社会而促发的毒品、犯罪和暴力的毁灭性魔力。

与私人区域的发展和非法工人阶级移民的强劲效能相反,公共部门对市中心贫民区,特别是拉美人 and 黑人街区,继续抱着先前那种有害的漠视态度。90年代,原本就已捉襟见肘的美国社会福利安全网,再次成为一个昂贵、苛刻和犯罪的天网(法

网)。本已庞大的美国刑罚体系，则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犯罪工业综合体。2000年罪犯人数的比率大于世界上除了俄罗斯和卢旺达之外的所有国家。美国的监禁率在90年代翻了一番，比欧共体国家高出6—12倍(Wacquant, 1999: 72)。如果要考察其所涉及的种族不平等现象，那么被关押起来的纯人口数量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局面(Wacquant, 2000)。据客观统计的可能性数据分析，黑人男性中三分之一的人有过被监禁的经历，而白人这一数据仅有二十五分之一，拉美人则有六分之一。90年代及本世纪前几年，“反毒战争”使得监禁率中的种族差异变得更为悬殊，因毒品犯罪被抓的黑人比白人多20倍。在89%的犯人都是黑人和拉美人的纽约州，这一差距更为突出(Macallairand Taqi-Eddin, 1990)。

纽约市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在1993—2001年任职期间，提出了对小犯罪的零忍耐政策，推行了臭名昭著的“修补破窗”政策(该政策源于修补破窗理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个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未得到及时修理，别人就可能受到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会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繁荣)，他本人也因此成为世界级的名人。这位市长主张严惩“生活质量犯罪”，即着重抓捕那些乞丐、玻璃擦洗工、在街上闲逛的穿着时髦的年轻黑人和拉美人。警察对少数族裔群体的残暴行为，引发了侵犯人权的公共丑闻，并使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请看下面的例子，警方审讯一位海地移民时，用一节断了的扫帚把多次插进他的肛门，对其动用酷刑；另一位手无寸铁的圭亚那移民在自己家门口被警察射了41枪。纽约市严惩犯罪的政策同样也是昂贵的。90年代，在纽约市保健、教育、领养儿童、公共教育等预算精简的同时，警察人数却从7000人急剧增长到前所未有的40000人。同一时期，纽约州花费4.5亿美元用于建造监狱，这还不包括经营开支。1998年在纽约州北部监狱，人均年花费32000美元，位于莱克岛上的纽约市监狱，每年的人均开销更是高达66000美元(Camp and Camp, 1998)。

一些严苛的毒品管理政策的支持者强调说90年代后期纽约市的犯罪率锐减，岂不知纽约市的犯罪率并不比那些没有实施查禁路人或提高警察抓捕率政策的其他城市低多少。事实上，统计学家已经指出，90年代纽约市最大化地提高监狱人口数量以促成犯罪率下降的情况，并不比那些低于平均监禁率的各州好多少(2000年9月28日《纽约时报》)，更何况1994年纽约市市长强化整治犯罪政策实施前，纽约乃至全国的犯罪率都已有所下降。政策分析人士认为，经济的全面增长以及18—

20 岁之间的人口流动量的减少，对降低犯罪率比控制犯罪策略的影响要大得多 (Blumstein and Wallman, 2000)。尽管学界和统计部门都对此做过批评，但纽约市实施的这一政策却成了解决城市困境的新办法成功的象征：“把犯小罪的少年犯特别是吸毒人员关起来”、“把穷人当做犯人” (Wacquant, 1999: 74, 15)。在危机中挣扎的不雅观的穷人，被驱逐出属于城市白人及中产阶级的公共场所。随着社会疾苦的恶化现象得以安全缓和，房地产价值飞升，旅游业的产值也达到历史新高。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我结交的那些毒贩朋友，除了年龄小、缺乏经验、比较狂暴的这类人之外，都设法逃过了牢狱之苦。90 年代后期的反毒品战争，对本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的生活形成最直接、具体影响的，反倒是由纽约官方颁布实施的联邦公建工程住宅房“一次犯罪必须搬离”的苛刻的处罚政策。90 年代中期，生活在公建工程住宅房中的家庭中一旦有人犯重罪，其余所有成员都得搬离，不管其年龄大小和社会身份高低。很多城市都没有严格执行这一联邦法令，但纽约市却这样做了。大多数毒贩通常都是和其家庭成员一起从家中被撵出来，很多人——包括本书中的两个主要人物——被迫离开曼哈顿或纽约州。整个纽约城里的老人为了给他们的孙子、孙女腾出客厅里的沙发，只好呆在街上。至于他们是否已经年老糊涂，是否知晓孙子们的犯罪行为，或是否可能是在孙子们的威胁下跑出来的，根本没人问津（比较 2002 年 3 月 27 日《纽约时报》）。最具戏剧性的是，因为纽约市无条件实施“一次犯罪必须搬离”政策，三位做母亲的因允许毒贩（本书中的主要人物）和她们住在一起而不得不搬进临时收容所或挤在亲戚家的客厅里。

最让人忧心的是，这种延续下来的毁灭模式落在了本书中几个毒贩的孩子身上。本书出版后，我每年至少回纽约一两次，每次都会尽量找到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向他们问声好，和他们叙叙旧。在后来的造访中，我有机会见到毒贩们初长成的孩子，其中好几个我在本书中都有所涉及。在这些孩子们身上，我看到了其经济条件的改善，但也对哈莱姆东区依然存在的社会疾苦有了新的认识。市中心贫民区居民中最脆弱的群体是那些孩子的孩子，他们被美国梦咀嚼后又被吐了出来，多年后回首过往的奔波与辛劳，却发现自己仍然以非同寻常的金钱和人格代价，深深陷入监狱工业的复合体中。

于圣弗朗西斯科

2002 年 4 月

目 录

2003 年第二版前言	3
绪论	1
第一章 直击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	15
第二章 哈莱姆东区街道的历史	37
第三章 快克买卖点的管理——癖好、规矩和尊严	59
第四章 “走向合法”——工作中的失礼和反抗	86
第五章 在校的日子——学会做个好罪犯	132
第六章 重画街道上的性别线	162
第七章 家庭及其痛苦中的孩子	198
第八章 脆弱的父亲们	219
第九章 结论	243
后记	250
2003 年版后记	258
注释	268
参考文献	285
中文版后记 失业虐待的机制性恶化	298
致谢	308
译后记	311

绪 论

伙计，我不怪现在的处境，要怪也只能怪我自己。

——普莱姆

我是悖于心愿走近可卡因的。1985年春季，我新婚不久，第一次搬进哈莱姆东区（也叫 El Barrio^[1]）时，想在纽约城找一个便宜点儿的公寓，打算在这个世界上最奢华的城市之一的中心地带住下来，写一本有关贫困和种族隔离制度的书。从理论上讲，我其实是对市中心街道文化的政治经济感兴趣；而从个人的、政治的角度来说，我主要是想通过论证种族隔离和经济边缘化给拉丁美洲人和黑人所造成的影响，来探究这一世界上最富足的工业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即致命弱点）。

毒品问题只是我要探究的诸多主题之一。我原本是想写有关整个地下（免税）经济，诸如路边的汽车修理、家政服务业、无照的场外赌场、毒品买卖等等。刚到那里时，我还从未听说过快克，事实上也没有人了解这一特殊的物质，因为这种由可卡因和发酵粉（碳酸氢钠）合制加工成的见效快、易吸用的易碎的小球在市场上还没见大量销售。^[2]然而到当年年底，我的朋友、邻居和熟人中的大多数人，却都被卷入这场涉及数亿美元的风暴之中：或买卖、或吸食、或为此伤神。

我跟踪他们，眼看着我租住的破旧公寓对面的住宅区的凶杀案发案率，一路飙升到曼哈顿几个最高的地区之一。^[3]一场大火后被废弃的建筑物前的人行道和我租住的屋子两边堆满垃圾的空地上，随处都可听见脚下踩着空瓶时发出的“嘎吱嘎吱”声。几乎是十年后，当本书付梓之时，尽管“毒品专家们”关于美国是否面临严重的“毒品问题”的讨论还在继续，但在这条人行道上，唯一的不同是，除了随处可见的用过的可卡因瓶子之外，又多了些皮下注射用的针管。90年代中期，海洛因的国际供应商降低了价格，提高了质量，在贫民窟内重新找回了市场，因而海洛因、快克和可卡因作为主要毒品种类，在市中心唾手可得。^[4]

地下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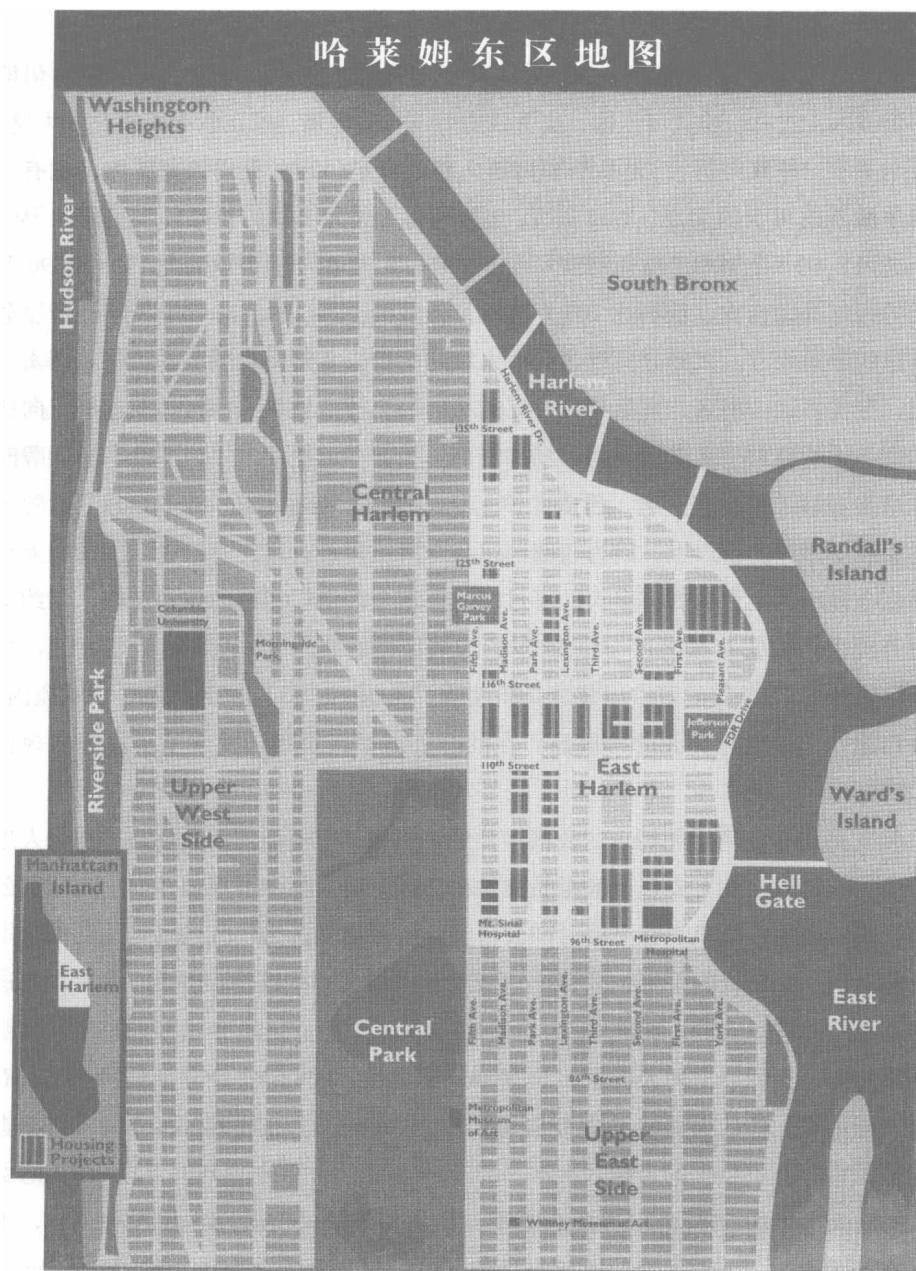
本书不是有关可卡因或毒品本身的书。市中心贫民区长期以来的毒品滥用仅仅是个症候——一个深层次的、动态的社会边缘化和异化形象的符号。当然，从最明显的个人层面来看，毒瘾和药品滥用只是街道上影响人们日常生活最直接、最冷酷的要素之一。不过，更重要的是，24位如今已经成为我的朋友们的街道毒贩和他们的家人，一点也不愿去谈论毒品问题。相反，他们想要让我理解他们是如何在贫困线上为了生存和尊严而斗争的。

官方资料显示，我的这些邻居们本应无家可归、食不果腹、衣衫褴褛才对。从曼哈顿的消费水准来看，他们中大部分人应该连房租和最低的食品消费都负担不起，更不用说水、电和煤气费用了。1990年的人口普查情况表明，哈莱姆东区有39.8%的当地居民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以下（全纽约市民的比例是16.3%），62.1%的人的收入大约为贫困线指数的两倍。我周围的这些街区尤其贫困，有半数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5]。考虑到纽约城基本的商品价格及服务价格，这意味着按照官方公布的经济标准，生活在哈莱姆东区半数以上的居民根本无法维持生计。

事实上，这里挨饿的人并不占多数。尽管仍会有许多老人和孩子忍饥受冻，但大部分居民都是穿着讲究，身体康健。巨大的、没有被普查到的、未征税的地下经济，让成千上万像哈莱姆东区的纽约人一样依靠最低福利生存——这些福利在美国人眼里属于最基本的必需品。我决心对这些另类的挣钱策略进行探究，考察它们何以使这些坐在门廊外、把车停在我公寓前的年轻男女们如此劳神费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区大约三分之一的家庭多多少少得到过公众资助。^[6]贫困家庭的家长们为了孩子的生存，不得不想办法补给他们肌瘦的脸颊。许多母亲靠给人带孩子或当清洁工挣点给养，有的可能会在周围六个夜总会和营业时间外的舞场找点活儿干，有的则偷偷在自家客厅里为服装承包商做点裁缝活儿，另外还有许多被迫和有钱的男人建立一种色情关系以补家用。

地下经济中男人们的挣钱方法则较为公开。有的在路边修理汽车，有的坐在门廊外等着那些没有执照的（未经许可的）包工头来雇他们做一些夜间拆除或修理窗户的活。许多人则在卖“数字”——街上卖彩票的行话。最多的是那些三五成群叫卖着“五分或一角钱”的非法毒品的营生，他们属于繁荣的地下经济中最坚实的、涉及数亿美元的部分。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可卡因和快克以及90年代中



Sources: Housing Environments Research Group,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Kevin Keamey, 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期的海洛因，为哈莱姆地区的人们提供了平等而最快捷的——如果不是唯一的——就业机遇。毒品轻而易举地敌过了其他合法或非法的挣钱门道。^[7]

我住的公寓前这条街道颇为典型。在我写最后一稿时，方圆两个街区内仍能买到海洛因、快克、粉状可卡因、皮下注射针剂、美散痛、安定和天使粉^[8]、大麻、墨斯卡灵（一种致幻剂）、走私酒和烟草。在距我家门廊一百码的范围内，就有三家竞争激烈的可卡因卖点，以2美元、3美元和5美元不等的价格私卖药瓶。再过几个街区，在一个当地“药丸制造厂”内，有位医生在一年内就开出了价值390万美元的医疗补助药方，获利达100万美元。他开的“药”中，有94%属于社会服务部界定的毒品处方。大部分药片都会被人拿到街角去零售或以低廉的价格重新卖给药店。在我们这一街区，有家买卖快克的小店的二楼，就有一家污秽的诊所，向成群枯瘦如柴的瘾君子私卖镇静药和鸦片制剂。我曾在那里度过了许多晚上的闲暇时间。这些瘾君子聚拢在一起，巴望着护士早点开门，把手写的“今日出诊”的牌子挂在亚麻布遮住的窗户上。因为权威部门从未对这里进行过突击检查，因而我无从查明这个诊所的生意到底有多大。不过，就在这个制造厂对面的住宅区内，纽约市住房管理机构的警察抓捕过一位55岁的母亲和她的两个22岁和16岁的女儿，当时她们正在把21磅重的可卡因装进0.25克重、价值10美元的“特大号”玻璃瓶内，制成市面价值100万美元的掺假品。在同一公寓里，警察还发现了小面额的现钞25000美元。

换句话说，在离哈莱姆东区公寓和公建住宅房咫尺范围内，只要有年轻人生活、成长的地方，就有成百万的毒品交易在进行。这些至少不用跑路、仅在他们公寓前的街角或在校园里卖毒品就可赚成倍钱的年轻男女，为什么还要坐地铁去市里的公司上班，拿最低的工资？实际上，我总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市中心贫民区有这么朝九晚五按时上班、加班的人，但却经常入不敷出。1990年哈莱姆东区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6岁以上的人口中，只有48%的男性、35%的女性有正经的工作，而全市范围内有工作的人男性平均为64%，女性为49%。^[9]在我的公寓周围人口普查过的范围内，16岁以上的人中，有53%的男性（3647人当中的1923人）、28%的女性（4626人当中的1307人）有合法工作。其余17%的民间劳动力还没有工作，不过正在努力寻找；而对整个哈莱姆东区的调查结果显示，没有工作的人数占16%，整个纽约城为9%。^[10]美国官方人口普查办公室的统计资料，对市中心居民区的困难估计显然有待考证。受人口普查署授权的调查，往往没法对20岁左右的黑人和

拉丁美洲人做精确统计。很多人担心自己参与了地下经济而遭报复，所以有意隐瞒他们的行踪。^[11]从1988年纽约城管理部门出示的报告中可以得知，20%以上的人没有被普查到。房管部门“过分拥挤”的结论，是从福利部门的交叉列表(cross-tabulating)和教育委员会管理部门开具的增长数字判断出来的。^[12]就在我住的公寓的周边，从16岁以上男女比例的失调——3647：4626——我们也可以看出普查中有多少男性公民被漏查。也就是说，如果按正常的男女比例来算的话，979个或27%的男性没有被普查到。在整个纽约城，16岁以上的男女比例要达到均衡，男性少了18%多；利用同一比例指数，哈莱姆东区的男性少了36%。

估算地下经济的大小尤其棘手，更不用说毒品买卖这一行了。^[13]首先，从其定义上来看，人口普查部门没有这一方面的数据。因为对市区的普查中漏查的个人要比家庭数更多，因而了解地下经济大小的一个可行办法，只能是以声称自己没有“工资收入”的一家人的数字为依据，但这仅能对不同住宅区的地下经济做最粗略的估算，因为有些家庭成员靠的是退休金或有限的、合法的自谋职业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其次，用这一方法估算毒品买卖的大小更是毫无意义，因为很多甚至大部分靠不交税的地下经济来补充收入的在家留守人员，都有其合法工作，并没有染指毒品。相反，许多从事地下经济的人也有其公开合法的工作。尽管如此，人们不得不假设大批无工资收入的在家人员很可能是依靠未纳税、未公开承认的收入来维持生计，而毒品买卖就是补充这一欠缺的重要来源。不管怎样，根据官方人口普查部门的统计数字，整个哈莱姆东区的所有家庭中，有40%的在家人员没有公开的工资收入，而整个纽约市的这一数据只有26%。我住的公寓周边的街区搞地下经济的人可能会稍多一些，3995人当中只有46%的在家人员有工资收入。接受公众资助的在家人员的比例是检测地下经济相对大小的另一个有效数据，因为没有人能仅靠福利而生存，他们靠公众资助所得到的合法收入，可以通过每半月一次的福利支票和每月一次的食物分配印章推理出来。在我居住的街区，有42%的人接受公众资助，在哈莱姆东区有34%，而整个纽约市则只有13%。^[14]

街道文化——抵抗和自毁

居于世界上最富足的城市却过着贫困的生活，痛苦郁闷和文化差异共同冲击着哈莱姆东区这些冒险出外谋生的年轻人，并催生出为主流社会所排斥的复杂而矛

表 1 1990 年人口调查街区社会指标对照一览表

	总人口	波多黎各人 (%)	非裔 美国人 (%)	贫困线下 居民 (%)	接受 官方援助 的户数 (%)	没有 工资收入 的户数 (%)	16 岁以上 被雇用的 女性 (%)	16 岁以上 被雇用的 男性 (%)	16 岁以上 男性与女性 均衡差异 百分比 (%)
快克屋	11599	56	33	49	42	46	28	53	27
哈莱姆东区	110599	52	39	40	34	40	35	48	36
纽约城	7322564	12	25	19	13	26	49	64	18

Sources: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Population Division 1992 [August 26];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1993 [March];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1993 [December]; 1990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Block Statis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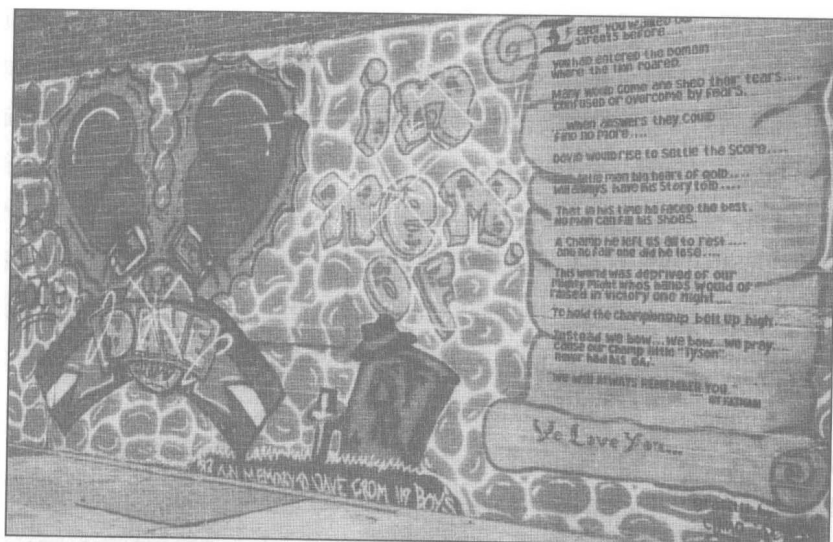
盾的信仰、象征、交往模式、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网，也即我所说的“市中心贫民区的街道文化”。街道文化为探讨自主的个人尊严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平台。以美国为个案，社会边缘人口向着政治和生态孤立的市中心地带的汇集，已经勃发起一个旨在抵制种族主义和经济边缘化的、一触即发的文化创造力。“抵抗性质的街道文化”并非连贯、自觉的政治抵抗体系，它是长期以来以对抗的形式出现、即时爆发的一系列抵抗实践活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主流社会通过时尚、音乐、电影和电视，最终使街道文化以诸多的抵抗形式重现和商业化，并使之循环性地表现为流行文化。^[15]事实上，美国中产阶级中一些表示自尊的语言形式，像“酷”、“公平交易”、“加油”等，都产生于市中心的街道上。

长期以来麻醉毒品的供应为现代街道文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使其较上一代更具强劲的诱惑力。然而，非法企业使其大部分参与者都深陷于暴力、毒品滥用和内化的愤怒等生活方式中。因此，抵抗性质的街道文化矛盾地预示着对其参与者及其庇护他们的社区起着毁灭性的作用。换句话说，尽管街道文化原本出于对个人尊严的寻求、对种族主义和被征服的拒斥，但最终却对个人和社区的毁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前所述，究竟有多少人卷入了不交税的地下经济是无论如何也计算不清的，更不用说那些吸毒、贩毒的人数。哈莱姆东区的大多数人与毒品毫无瓜葛。^[16]不过问题是，占大多数的守法公民已经失去了对公共场所的控制，且不说他们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



哈莱姆东区的再占有：前任房管把一些动物玩具放在这栋废弃的大楼上，用来保护这一街区的破败，这里成了交易毒品的最佳去处。照片提供：Henry Chalfant。



这是离游戏厅不远的地方，对一位被谋杀的年轻人的纪念物。他本有望成为一名职业拳击手。照片提供：Oscar Vargas。

例，这些勤恳的、远离毒品的哈莱姆人已经被推挤到防御境地。大部分人生活在对其邻居的恐惧和鄙视中，担惊受怕的父母为使孩子远离街道文化的浸染，把他们关在家里，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早日搬离这里。

因此，本书所涉及的毒贩只代表哈莱姆东区的一小部分居民，但他们却在努力确立着这里公众生活的基调。他们迫使当地居民，特别是妇女和老人担心遭遇强暴或抢劫。公然聚集在街角、面色憔悴的瘾君子们，引起了当地不吸毒居民的同情、痛心和愤怒。更重要的是，街道上的毒贩每天都在为其周围未谙世事的年轻人提供一种极具诱惑力、但却有暴力和自毁性质的另类生活方式。

不管在数量上有多么微不足道，那些在市中心街道上靠毒品发迹的人却不容忽视，他们同样需要人们的理解。因此，住在哈莱姆东区的那些年里，我选择吸毒者、小偷和毒贩做我最好的朋友和熟人。美国市中心贫民区能够引发人们悲怜的因素，在街道这一毒品买卖天地里呈现得最为清楚。套句老话：“于不寻常中见寻常”，本书中这些毒贩和吸毒的人对贫困和种族隔离的极端或极具讽刺意味的反应，有助于洞悉多数行业中脆弱的人群，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压下，是如何以这样那样的形式经历着快速的结构变化这一过程。纽约市波多黎各人的经历也毫无例外，只是不论是在范围还是速度上，他们付出的代价和贫困程度都要更为突出；而美国正是凭